

2809

西和文史资料

第71-76号

第71、72、73
政协西和县委员会

第十四期
(1994年)



西和县七十年代粮食生产情况分析

胡有智

多年以来，衡量我县粮食产量的水平均以七十年代的1975年为最高标尺。为什么七十年代是我县解放以来乃至九十年代初期，粮食产量最高的时期呢？我简要谈谈自己肤浅的看法。

农业生产是一个露天工厂生产方式，它不但受人为因素和作物内部机制变化因素的影响，而且还要受气象因素的影响。特别在靠雨养农的西和，更是如此。农业收成之丰歉，决定于光、热、水等气象条件是否协调适宜。所以我想避开政治因素来探讨这个问题。首先，谈谈七十年代初期我县的气象因素，其次谈谈人为因素。

一、气象因素的影响。

我县地理位置处在秦岭西北坡，属阴湿山区。就农业生产丰歉而言，光照、气温多寡高低是决定性因素。从1969年至1975年

的七年间，全县程度不同地出现过冬干、春旱、夏旱，这七年也是大抓水利建设的高潮期。由解放初期的五项水利工程发展到八〇年的554项；有效保灌面积由各500亩发展到55832亩和44398亩。通过“三查三定”和区划调查核实，自流渠道126条，全长137公里；水库七座；塘坝59座；提灌站155处，181级；机电井189眼。这些设施大都是七十年代初期搞起来的。据资料记载，我县1975年以前伏旱较频繁^数。自1965年至今，伏旱严重的年份有：1969年、1971年、1972年、1973年、1974年，1970年较轻。这些年份伏期降水量在55毫米以下，比常年平均值低36%——65%。干旱给当年川坝区和西汉水河谷区的农业生产带来一定的影响，但却大幅度增加了光照时数和土壤积温，恰好解决了全县大面积阴湿山区光照时数少和积温不足的问题，使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特别对占全县80%左右的“旱三年骑着马出来，涝三年拄着讨饭棍出来”的阴湿山区，增产幅度就更大了。西高山乡的杜山村就属这类情况，1975年春一次向国家贡献了24万斤储备粮食，人均达到200多斤。当时全县大部分山区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给川坝地区群众借储各粮食的情况，就是明显的例证。

二、人为因素的影响

《齐民要术》中“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和“任情返道、劳而无获”的古训，对人在农业生产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做

了充分的肯定。解放以后，毛主席科学地总结出农业“八字宪法”，把农业生产中“天”、“地”、“人”的关系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它是发展农业生产的根本大法。我县七十年代初粮食产量在解放后40年中达到最高水平。人为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狠抓了改土深翻。1969年全国北方农业会议后，全县掀起了兴修梯田的高潮。1971年梯田累计达到7.21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14.5%；1975年累计达到29.55万亩，占总耕地的43.5%。1973年全县拥有耕作机械7041马力，有大中型拖拉机94台，有11个公社建立了拖拉机站，拖拉机总耕作量达到23.3万亩；1976年机耕面积达到11.6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四分之一。当时姜席公社下胡大队第三、四生产队雇用县良种场东55型拖拉机顺梯田地块可从山脚耕到山顶，实耕面积达到600多亩，可见机耕深翻面积之大。

与此同时，全县又动员大搞人工深翻。72年统计，人工深翻面积10万亩。原西高山公社党委书记徐自发同志组织动员群众用大板锹深翻土地，深度达到八寸左右；所有耕地三年深翻一遍，71年全公社粮食产量达到99.5万斤，比69年44.9万斤增加了一倍多。

第二、狠抓了肥料建设和化肥的使用。七十年代初期，除狠抓了农家肥的积送、不足部分又动员群众采取打炕换墙等常规措施外，还在全县大力推广了罐罐厕所的使用，做到了精肥上山，使过去某些地

方“白籽下种”的现象有了很大改变。同时全县农民还普遍掌握了化肥施用技术，化肥施用量1970年达到5298自然吨，比1969年增加了七倍多。71——75年的五年间平均化肥施用量5339自然吨，比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年均1303自然吨增加3倍多，最高的1975年达到9656自然吨。

第三、狠抓了农作物品种的改良工作。良种是农作物增产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因素。七十年代初期是我县三大作物良种推广的高潮期。小麦面积一直占全县粮食作物面积的半数左右，但因品种不优面产量低下。1970年引进推广春性品种“甘麦”系，74——75年种植面积达到16万亩，占小麦面积的59.8%，其中甘麦8号9万亩，占小麦面积的34.9%。同时还在高半山区推广了“中梁”5号、11号等品种，使我县的小麦产量获得了空前的大提高。县统计局的资料表明，1975年的小麦产量是1949年的4倍和七十年代前产量最高的1965年的3倍。玉米以1956年引进的“金皇后”、“英粒子”、“白马牙”等高产品种为主，全县普及率最高也是在七十年代初。另外还大面积推广了“安东黄马牙”，解决了半山区玉米难以成熟的问题，使玉米产量达到5000万斤，比最高的1965年增长了1.3倍。洋芋品种在七十年代以前一直以当地老品种麻洋芋（即蓝洋芋）为主。七十年代初在全县搞起了大规模的洋芋品种更新换代，但因疏忽检疫工作，调进的“渭会”系品种带来了环腐病；

而调进的礼县湫山的“中熟”品种不仅产量高而且又品质好。同时还大面积推广了‘天薯’序列品种，因当时在何坝的黄江试验、示范进而推广到全县的，所以群众亦称“黄江洋芋”和“牛头”洋芋品种基本淘汰了当地蓝洋芋，产量比1965年增产30%以上。

第四，狠抓了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县委主持工作的张万祥副书记，组织农技人员在认真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73年3月召开了一次全县三级干部参加的‘西和县科学种田黄江现场会议’。会议在《大搞科学种田，向农业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的总结报告中深刻地指出，西和农业生产的现状仍然是‘旧而粗’的耕作方法。主要表现在旧品种、旧耕头、旧方法的‘三旧’和粗耕、粗种、粗管、粗收的‘四粗’上。明确提出了西和农业生产必须遵循的四条基本观点：一是要遵循不断发展的观点，正确处理老经验与新技术的关系；二是要遵循否定之否定的观点，正确处理‘破’和‘立’的关系；三是要遵循实践第一的观点，正确处理认识和改造的关系；四是要遵循因地制宜的观点，正确处理普遍与特殊的关系。

这次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将全县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2609

西和文史资料

第七十期

政协西和县委员会



一九九四年七月八日

出席全国烈、军属代表会议情况回忆

何有明

一九五一年冬季，我二哥何方元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朝鲜战场上光荣牺牲了，年仅二十岁。

一九五九年五月十八日至二十七日，我以烈属代表的身份，光荣地出席了由内务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召开的全国烈属、军属、复员、转业、残废、退伍军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共1088名。在这些代表中，有黄继光的母亲邓芳子，刘胡兰的母亲胡文秀，董存瑞、罗盛教、杨连弟的父亲，“二·七”烈士林祥谦的夫人，电影《永不消失的电波》中男主角李侠烈士的爱人龚惠英，“晋察冀子弟兵母亲”戎冠秀，狼牙山五壮士之一的宋学义，《林海雪原》中的模范侦察员孙达德，山西

女英雄巾纪兰等。

我于四月二十七日由西和出发，在省政府民政厅报到，五月七日到达北京，住在西苑大旅社北楼212房间。

五月八日上午，内务部钱部长打电话给甘肃代表队，要我下午不要出去，她来找我谈点情况。下午三时，我在窗口看见一辆黑色小轿车驶来，我急忙走下楼去。钱部长问：“哪一位是何有明同志？”我说“我就是”。钱部长紧紧握住我的手热情问候。我将钱部长迎接到我的房间坐定后，钱部长问：“你多大年龄了？”我回答：“二十二岁”。她亲切地鼓励说：“不简单，好好干，前途很大！”然后她又说：“我来向你了解一下西和晚家峡发暴雨淌死100多人的事。你是当地人，是否知道些情况？”我说：“知道些。四月十二号发了一场大水，河水猛涨，晚家峡的口子太窄，被冲倒的树木把峡口堵住，回水淹上去，把丰坪、麻庄沿河边住的50多户群众都冲走了，死亡人数127人。灾情发生后，西礼县委、县人民委员会、西和公社的领导和大部分干部及时赶赴灾情现场同群众一道抗洪救灾。”钱部长追问一句：“死的人都找见了？怎么安葬的？”我回答：“大部分尸体找到了，凡找到的都用木板、门扇、床板做的棺材安葬了。”钱部长又问：“水灾再发生过没有？”我回答：“再没有发生。”钱部长又问：“受灾群众生活安排得怎么样？人口有外流的没有？”我回答：“县上、公社都发了回销粮、救济款，目前还没有外流的，正在

组织群众生产自救’。就这样，钱部长和我谈了两个多小时，她的秘书部一一作了记录。最后，钱部长又紧紧握住我的手说：“今天和你就谈这些。你们来一回北京不容易。现在离开会还有十多天。请你们早来北京报到，就是想安排你们到北京各风景名胜区好好看看。生活好不好？有什么意见及时给我们提出来。”我回答：“生活很好。昨天一到北京，我们就去看了天安门。”下午五时，我送钱部长上车后回到住室，甘肃代表都拥进我的住室问情况，我兴奋得连饭都不想吃。

开会前的十多天，大会组织我们去故宫、十三陵、香山、颐和园、景山公园、八达岭等地参观名胜古迹；每晚安排我们在总政文工团、中央杂技团、梅剧院观看精彩的文艺节目。北京市的人民，不愧是伟大祖国的首都和毛主席身边的人民，他们非常礼貌。因我们每个人胸前都佩戴着代表证和大红花，所以一上车他们就主动让座；每到一个商店，都热情地为我们选购商品；街上碰见学生、儿童，先是行个礼，接着就喊“向英雄学习！”“向英雄致敬！”的口号，使我们非常感动，深受教育。

五月十八日上午九时，大会在全国政协礼堂隆重举行开幕式，总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上将主持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董必武和罗荣桓、彭真、贺龙、陈毅、徐向前、谭震林、李富春、陈赓、钱英等党和国家以及军队的领导人出席了大会，内务部长钱英作了报告。会议期间，董必武副主席代表党中央、毛主席作

了重要指示，博一波副总理，罗瑞卿副总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甘泗淇上将，农业部长廖鲁言等，都到会讲了话，陈赓大将，陈锡联上将多次和代表座谈，四十多位代表在大会上发了言。在向大会献词献礼的时候，我将自己的作品《何有明诗集》向大会作了献礼，甘泗淇主任和钱英部长在主席台上接受了我的献礼。

五月二十一日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这天上午，大会向各省代表队负责人通知，让我们这一天不要外出，不准带枪支、照相机和任何武器，服装要整洁，下午中央首长要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全体代表。当甘肃代表队袁队长向我通报这个消息后，我的心情再也无法平静下来。下午三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朱德、周恩来、林伯渠、邓小平、陈云、彭真、李富春、谭震霖、博一波、林彪、贺龙、陈毅、罗荣桓、罗瑞卿、陈庚、甘泗淇、钱英等四十多位首长满面笑容，互相鼓掌，健步而亲切地向代表们走来，同全体代表合影留念。照相之后，中央首长又一次向代表们鼓掌致意，全体代表掌声雷动。当我们乘车回到住地的时候，每个人的心情都异常地激动和兴奋。

五月二十三日，大会安排我们去看了航空表演，我坐在董必武副主席前面。

五月二十四日晚，我们去梅剧团看梅兰芳主演的《奇双会》，我又坐在董必武、罗荣桓等中央首长的后面。演出结束后，按照大会安

排。我们抬上花篮，同董副主席、罗元帅、甘主任、钱部长等上台向梅兰芳等演员，献花篮，并合影留念。

会议期间，大会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发了致敬电，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发了致敬电，向全国发了倡议书。《人民日报》发表了‘继续发扬革命传统’的社论，《解放军报》发表了“向亲人们和战友们致敬”的社论。山西、吉林、湖北、湖南、河北、贵州、浙江等七省的党、政、军机关向大会发来了贺信；兰州军区、海军、空军、炮兵、通讯兵、装甲兵、工程兵等司令部和政治部也发了贺信。

大会期间，我们同全国著名战斗英雄宋学义等30多位代表举行过座谈，互相交流、照相和签名留念。

大会历时十天，五月二十七日下午在政协礼堂胜利闭幕。西苑大餐厅举行了有八十七种名菜组成的国宴，敬爱的周总理、罗荣桓元帅等党、政、军领导人和代表们欢聚一堂，共庆大会胜利闭幕。我和钱英部长同坐一席。宴会开始，周总理首先向大家敬酒，祝代表们身体健康、工作顺利，紧接着各省选一名代表向总理敬酒。因甘肃代表队唯我年龄最小，又是唯一的烈属代表，故选我去向敬爱的周总理等中央首长敬酒。我捧上茅台酒兴致勃勃地急步前去，说：“我代表甘肃30名代表向敬爱的周总理敬酒，祝首长身体健康，工作顺利！”总理也端着一杯酒，把我打量了一下，说：“小伙子很年青。来！我俩碰一杯！”我一时不知所措，猛地喝了下去。因我没喝过酒，杯又大，

喝得头晕眼花，还想给罗元帅等敬酒，但不行了，只好回到桌上。钱部长将大伙面前的梨子都给我吃，幸好同桌有一位医院院长，给我吃了两片药，过了一会儿渐渐地好了。

会议结束时，给我们每个代表发了一本纪念册，上面有中央领导讲话、致电、报告、贺信、社论、倡议、代表名单等，还发了一枚金星奖章，金笔，笔记本等。

六月一日，我回到了西礼县，向县委、政府、武装部作了汇报，在马立志县长、刘玉香部长陪同下，我在师范、广播局等单位向全县人民汇报了大会盛况及其会议精神和对我的深刻教育。很多人争相观看我们同国家领导人一起照的六尺长的合影照片，人人都竖起大拇指：“了不起，了不起！”

一九六〇年正当西礼人民生活极度困难、“下水救人”之际，钱英部长亲临西礼视察，我又一次和钱部长见面并汇报了我的工作，她对我又一次给了很大鼓励。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转瞬三十多个年头过去了。每当我回忆起参加这次会议的情况，回忆起敬爱的周总理及其他中央领导人的光辉形象来，幸福的热泪潜然而下，思念的涟漪涌上心头……

2609

西和文史资料

第七十六期

政协西和县委员会

一九九四年十月一日



杜正泽其人轶事

卢海清

杜正泽，字润之，西和县南关人，生于清咸丰年间，壮年时，在衙门班房跑腿。南关有一士绅孙老先生，家境殷实，为人正直，乐于助人，声望很高，并开设“丰盛公”商号一座。东后街刘世荣亦是县城士绅之一，人称“刘四老爷”。一日刘设宴请客，孙老被邀去吃酒，杜正泽恰在刘府作招待。这天孙老吃酒过多，晚上由杜正泽掌纱灯送他回家。在路上，孙老对杜说：“你年轻力壮、聪明能干，为何不经商赚钱，给班房跑腿有啥意思？”杜说：“我本想做生意，只是苦于无本，干这官生，也是生活所迫。”孙老大笑：“只要你愿干，我给你本钱。”杜闻言大喜。送孙老回到府上，堂前曲身便拜。孙老忙扶起正泽，道：“不必如此。你走正道作商，我很高兴，本钱年后来取。”翌年正月初一，杜给孙老去拜年，提起经商搭本之事，孙老竟说是开

玩笑的。杜顿时垂头不语。适逢孙老天人也在，便帮腔说：“我看正洋人能干，我家银子闲放着，拾本作回是正事。那晚你对正洋说的话，我听得清楚，咋说是笑话？”孙老哈哈大笑：“我刚才说的，只是开玩笑罢了。给正洋四百两银子，过几天来取。”正月十六，杜在孙府取回四百两纹银，择日闯荡陕西三原经商。三原盛产棉花布匹，是当时西和的主要通商之处。那里商业繁荣，客商云集，要钱成风，日夜聚赌，杜不慎误入歧途，银两输光，空手回家，闭门不出。孙老得知此情，差人将其叫去，对杜之所为一字未提，只是说：“给你的本钱可能少一点，我再给你四百两银子，望你好好经营。”杜带银又去三原。心中暗想：“孙老对我赌钱的事没有过问，令人不解。输去的四百两，作商何日挣回，将来咋作交待？我要捞回输去的银两，然后金盆洗手，一心经商。”可事与愿违，竟又输掉四百两。这下忧郁成疾，抱病回家，卧床不起。孙老闻知，请医给杜治病，开送去疗养食物。一月之后，杜病大愈，孙老又将他叫去，仍未提及赌钱之事，只对杜说：“你病痊愈，今逢黄道吉日，我再给你添银四百两。三原作商，万不可走邪路！”话中有音，杜甚感激，拜别孙老，即日起程，三赴三原。杜到三原后，天气闷热，风云骤变，大雨倾盆，连降数日，泾河暴涨，切断两岸行人，三原行栈的货物无人问津。杜对此情景，计议再三，终于大悟，便找了一个大萝卜，用刀作成图章，上刻‘杜’字，随身携带，到各行栈言价订购货物，并盖上‘杜’字戳记。自云身带银两

有限，待河水回落后再付清订货银两，各行栈货主认可，购金未付。数日之后，河水下降，两岸恢复通行，来三原的客商货物脱手后，购不到回头之货，纷纷找杜求购，杜以商价转手出售，获利甚多。杜当即在三原开设“丰盛和”商号一座，生意兴隆，财力大增。可是他仍旧念念不忘输去的八百两银子，又一次闯进赌场，结果输得更惨。走投无路之时，便返回西和，对孙老伴称：三原货物积压，周转不灵。孙老闻言，又给了四百两银子。杜回三原，听说黑红宝场有一大赌注：压棉花一百包。他把心一横：成败在此一举！他冒险掏宝，侥幸获胜。将赢来的一百个棉花包盖上“杜”字戳记，驱驮马载，浩浩荡荡运回西和。脚户未等货主赶到，便将棉花包卸在县城南大街上。孙老见状，对家中人说：“这棉花肯定是正泽发来的，快去收货。”紧接着杜正泽押运的土布等货物，也相继运到。杜去孙府。他在三原屡屡赌钱之事，孙老了如指掌，今日虽则他满载而归，但孙老并不高兴。孙老对杜说：“我给你本钱，为的是支持你经商生财，而不是让你赌博耍钱。你在三原的作为，我何曾不知，只是未责备你罢了。正泽，你要好好思量。”孙老对杜的教诲，杜感慨万千，洗心革面地跪倒在孙老面前道：“二位老人给予我无为不至的关怀，出资搭本支持我经商，可恨我不争气，在三原误入歧途，连续输去八百两巨银！惊恐难当之际，忧郁病倒，您老知道后非但未加指责，还给我请医治病，又给我四百两银子支持我继续经商。您老的大恩大德，我毕生难忘；今日的教诲，

我铭记在心，发誓再不赌博，一心经商。您老若不嫌弃，请收我为义子，拜于二老膝下，报答大恩。”杜的翻然悔悟，孙老甚为高兴，乐收义子。正泽惊喜，纳头便拜。

杜在三原继续经商，大发其财。后将“丰盛和”商号由三原迁回西和县城，修房盖舍，购田头地，成为县城有名的新发户。他给孙老还钱的场面，非常隆重壮观：十二张圆桌，红彩铺面；八张大桌，各呈放五十两大宝四个；另有四张桌子呈放其它礼物。唢呐高奏，鞭炮齐鸣，吹吹打打，拥进孙府。大宝供在堂上，礼物并列左右，点燃香烛。正泽拜谒义父义母，双手呈上麦衣川十石籽的地契，并祝二老高寿康宁。这天孙杜两家张灯结彩，大宴宾客，觥筹交错，热闹非凡。

孙老谢世后，正泽披麻戴孝，坐铺守灵，泣血疾首，送葬义父。孙老之乐于助人、善于教人，正泽之改邪归正、富不忘本，众口皆碑，美名传颂。

可惜，杜正泽生不逢时，腐朽没落的封建官僚制度，又将他诱入歧途。在清光绪时，凡向朝廷捐献金银者，均可加封官职，名曰“捐官”，虽有权无职，但可扬名显贵。杜正泽出银千两，以武庠生加封为“衍圣公百户司”，从此人称“杜老爷”。他有绿轿一顶，正月初一、四月初八去隍庙进香或亲友家吃酒，乘轿来去，大摆威风。

杜亲生一男一女。其子杜玉子，吸食大烟，要钱赌博，吃酒作乐，挥金如土。他所花银两，均是向“恒兴公”等商号借的，并立有“由

父还债’的借约。杜闻此事后，备酒设席，请来债主及县城知名绅士。席前杜云：“听说我儿玉子向各位借了债，现请各位拿出借据，我如数还清。”由父还债是高利贷。杜正泽这时有钱有势，谁还敢承认借债之事，都说并无此事。杜正泽大笑：“今有各位绅士在座为证，既然大家说无借债之事，我也很高兴。”一口吹光了儿子所借债务。

光绪十七年（1891），新任西和知县蔡如苏上任，去拜望杜正泽，杜盛情接待。酒后杜向蔡诉说其子不学好，请帮助教育，蔡满口答应，但口说无凭，要有事实根据。此后杜将其子行为不轨之事写成材料交给蔡知县。蔡出签捆了杜玉子，并命人在大堂院前制作木笼，扬言要除缺忤逆。杜正泽闻言着慌，急忙给蔡知县送去四百两银子求情。蔡推让数次后将银子收下，对杜说：“做木笼除忤逆，只是吓唬一下你儿子，叫他改过重新作人罢了。”杜这才放下心来，杜玉子被保释回家。但杜正泽深感其子不走正道，又丢人现眼，将来难以继承家业，不得以便将杜四之子杜禄娃过继为己子，起名杜思继。

陇东镇守使张兆钾，年少时和母亲流落西和，生活艰难，后来其母又病逝，更是贫困交加。一日杜正泽在街头邂逅张兆钾，见其惨状，心出怜悯，便对张说：“你在西和吃尽苦头，你母又逝，为何不回庆阳老家而要死守西和？”张说：“我现在连饭都吃不上，哪里还有盘费回家。”杜对离乡受困的张兆钾更加同情，就答应给张二百两银子让其回家，张兆钾感动得五体投地。

光绪十八年，知县蔡如苏倡导重修濠源书院（今南关小学），杜正泽积极响应，捐钱五千缗，受到社会赞扬。

杜正泽民国初年逝世，杜忠继继承家产，有现银三万六千两。杜忠继出银一万多两搭本开设“中盛堂”、“义盛堂”、“中盛荣”、“元盛通”、“双盛和”等十座商号。他在汉中娶妾，一次就花银三千两。民国八年（1919）给父亲杜正泽在南关修明牌坊一座，上书“急公好义”四字。在牌坊落成之日，请天水红盛社，西和福德社和二班剧社，对台演戏数日，花银甚多，三万六千两纹银所剩无几。张兆钾发迹任陇东镇守使，杜忠继得知后，给张去信，说要去陇东一游，张甚表欢迎。杜忠继到达庆阳时，张兆钾带领部队与庆阳士绅一道出城迎接，公馆设宴盛情招待，紧接着便是驻军部队头头及各方士绅名流轮番宴请杜忠继，吃吃喝喝一个多月。张兆钾还给杜忠继备一轿车，供他在庆阳游玩。张为报答杜正泽对他赠银解困的恩情，想给杜少爷委以县长职务。但经他观察，杜忠继难以胜任，就给杜五百两银子送他回到西和。

杜忠继游手好闲，生活奢侈，将留家业场了个净光，竟陷入穷极潦倒的地步。

供稿后述：我三太爷于光绪年间，在三原经商，民国初年在县城开设“治中和”商号。有关杜正泽的情况，他曾对我比说过，现仍言犹在耳。孙先生是孙则铭的祖父。我整理《杜正泽轶事》时，又向李